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批评范式与当代价值^{*}

陈文斌

摘要：“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并非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肆意拼贴，更不是符号学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嫁接。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内含着符号学思想，符号学在研究对象上与马克思主义至为契合。历史唯物主义与形式文化理论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文化批判上虽然范式不同，却能相互补充与彼此支撑。厘定“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概念争议与内部构成，廓清其批评范式与理论诉求，可以不断激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形式文化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文化批判

The Critical Paradigm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ist Semiotics

Chen Wenbin

Abstract: Marxist semiotics is not an arbitrary collage of Marxism and semiotics, nor is it a simple grafting of semiotics onto Marxism. Rather, Marxism contains semiotic ideas, and semiotics is very much in line with Marxism in terms of research object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formal cultural theory can complement and support each other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ritique of culture, even though their paradigms are different. By clarifying the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思想谱系及当代价值研究”（23YJCZH021）阶段性成果。

conceptual controversy and internal composition of Marxist semiotics, and by clarifying its critical paradigm and theoretical demands,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ist theory can be continuously activated.

Keywords: Marxist semiotics, formal culture theory,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cultural criticism

DOI: 10.13760/b.cnki.sam.202402004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究竟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尚未达成共识。究其原因，概念定名、学科属性、历史语境都作用其间。就概念定名而言，“马克思主义符号学”（Marxist Semiotics）与“符号学马克思主义”（Semiotic Marxism）这两个概念是否同一存在争议。就学科属性而言，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面临着“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刻板评价。就历史语境而言，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结构主义在70年代被“后结构主义”冲击，与此同时，符号学反而还被等同于结构主义^①，这使得语境与理论事实相割裂。“中国学界在80年代基本上把结构主义当做符号学的同义词。此种混淆妨碍了符号学在中国的展开，到后来变成符号学界不得不花力气摆脱的一个纠缠。”（赵毅衡，2018，p. 148）由此，“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意义指涉、研究范式、适用语境等问题上亟待澄清。

21世纪以来，中国符号学研究进入加速期，学术产量激增的背后，不仅是符号学范式的跨学科能力及文本阐释效力的彰显，更重要的是，历史语境变动催生了更多的符号问题，如符号生产的泛滥、符号交换的加速、符号消费的异化等，迫使研究者需要连通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域。数字化技术强化了符号的支配性地位，人工智能又挑战了人与符号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如此，马克思主义所直面的社会现实被符号强势裹挟，符号编织的意义之网不得不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剖析的对象。基于此，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结合顺应了现实变动与理论对话的趋势，进而，厘定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批判范式与理论效用就显得更为紧迫。

^① 特伦斯·霍克斯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1977）一书中，将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等同，认为“很难把符号学和结构主义区别开来”，“两个学科的兴趣基本上是相同的”。而西比奥克在《国际符号学系列》1984年第2期撰文批评“这种对事实真相的误解大错特错”。事实上，将符号学等同于结构主义制约了符号学的发展，找出两者的区别则是在为符号学的独特性辩护。

一、何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与“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在具体使用上可以是无差别的，但如果一定要严苛划分，这两个概念因论者或语境不同而在意义指涉上又有差异。“符号学马克思主义”被视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现的一种新方向”，这里面包括了一系列理论，这些理论的总体倾向是“力图颠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还进一步认为，上层建筑（如意识形态和语言逻辑）是整个社会构成的逻辑”（Bergesen, 1993, p. 1）。这一逻辑翻转的肇始者是葛兰西，集大成者则是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究其实质，“符号学马克思主义”与“文化主义马克思主义”相接近，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种变体。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则是要将马克思主义包含在符号学范式内，即认为“马克思主义批判属于符号学分析”（Pertrilli, Ponzio, 2012, p. 154）。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商品、货币的分析，有关意识形态的阐释，有关社会关系的剖析，在其底层逻辑上都暗合着符号学分析思路。当然，这种包含关系也设置了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从广义范畴理解符号学，它指认“‘符号学’这一术语不仅是一般符号科学的名称，它还指人类为了对符号进行反省并采取相应行动而使用符号的特异性倾向”（Trifonas, 2015, p. 716）。换言之，整个意义世界中的符号主体、符号对象、符号活动及符号关系都统摄在符号学之内。第二个前提是保留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各自的独立性，“检测符号学理论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承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反之亦然，检测面对符号科学各种发展，马克思主义系统的弹性会达到何种程度”（张碧，唐小林，2016，p. 227）。在这两个前提下，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就形成了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的关系。总结来看，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是在并置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基础上，从广义的符号学视域吸纳马克思主义的论域。

理清“符号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指向差别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反而引出了两者纠缠的问题根源。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都自成体系，也都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演变与更新。经典马克思主义在诞生之初就遭遇简化与误读，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调整、革命语境变化、阶级斗争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问题也发生转移，即“主题变换（从经济基础向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和形式转移（从政治经济学到哲学和文化批判）”（张

一兵, 胡大平, 张亮, 2004, p. 67)。再之后, 后马克思主义浪潮也在不断挑战与修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断(西姆, 2011, pp. 256 - 267)。在这个过程中, 马克思主义的固有范式经受着质疑、挑战、补充与再阐释。这样的理论状貌使得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谈论以及谈论何种前缀的马克思主义, 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之后成形的符号学也面临着相似的境遇。自 20 世纪初索绪尔二元范式带来的“语言学转向”始, 人文社科领域掀起了结构主义浪潮,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罗兰·巴尔特的“神话学”、让·皮亚杰的“结构主义心理学”、路易·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雅各布森的“结构主义语言学”、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等都借鉴并改造了索绪尔的二元范式。到 70 年代, 随着结构主义浪潮的消退, 皮尔斯三元范式与后结构主义浪潮契合, 原有的二元封闭性被三元开放性冲击, “能指-所指”的意义绑定被“符号-对象-解释项”带向了无限衍义, 由此契合了后现代主义消解宏大叙事的理论诉求。

从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各自的发展历程看, 两者在发展中都有变化, 因此, 何种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与何种范式的符号学结合, 又成了更为困扰人的难题。为了缓解这一困境, “何种”的问题在实际操作层面被搁置。不论是马克思主义中的符号学思想, 还是符号学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抑或是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综合思想, 都被纳入“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这一范畴。好处在于, 论者不需要耗费太多精力去澄清对象边界; 弊端在于,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可能陷入各种修饰、调和与泛化之中。

二、进入中国语境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

进入中国语境,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成为万金油式的黏合剂。一者,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囊括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观点。不可否认, 这其中有诸多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结合范例, 如齐美尔的“货币符号学”、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但无所不包的吸纳掩盖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特性, 如将布拉格学派、巴赫金小组、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学派、沃尔佩学派、伯明翰学派等都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理论流派就显得过于粗泛。

二者, “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被等同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成果, 围绕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的关系辨析都被扩大化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论

域。这带来的结果就是“语言学转向后的文论大都可以纳入符号学文论的范围讨论，而文论与文化批评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就不能不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唐小林，2020，p. 8）。但事实上，“文学性”“陌生化”等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关联不大。

三者，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符号学又被视为社会批判的有效范式，因此一旦涉及社会批判都被泛化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按照这一思路判定，“马克思主义的符号学批评往往通过对社会文化文本的深入剖析，发掘其中所具有的隐喻含义”（张碧，2022，pp. 135 - 136）。而事实上，“批判资本主义并不一定就是马克思主义”（张一兵，2009，p. 28）。对社会文化文本的深层意义开掘也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专利。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确要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但不仅方法是符号学式的分析，其批评对象也从资本主义的经济霸权、文化霸权，转入符号霸权”（赵毅衡，2012，p. 16）。这意味着，在指导精神、分析范式之外，还必须得有研究对象的聚焦，即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成的符号问题，而非广义上的全部社会文化现象。

概念意义泛化的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表面上声势浩大，其内核却模糊不清且交叠混杂。“80年代以来符号学进入中国学术领域之后几乎成为纯粹形式结构的符号学，无视了马克思主义维度，这无疑延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思考。”（傅其林，2015，p. 20）21世纪以来，符号学的应用从文学艺术文本扩展到社会文化全域，符号学诸门类的繁荣强化了符号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公分母”（赵毅衡，2009，p. 169）的认知。该认知的强化与普及，又加速了符号学的跨学科融合，如哲学、人类学、美学、传播学等都在与符号学的结合中壮大了声势。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勃兴正是符号学总体繁荣趋势的产物，但是，符号学在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过程中尚未廓清对象及论域，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维度的欠缺翻转为泛化。因此，要澄清“何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就必须确定其批评范式与理论诉求，继而凸显形式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相互补充与彼此支撑的路径。

三、基于形式分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主义不乏有关符号的论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就指出：“由于货币在某些职能上可以用它本身单纯的符号来代替，又产生了另一种误解，以为货币是一种单纯符号。但另一方面，在这种误解里面包含

了一种预感：物的货币形式是物本身以外的东西，它只是隐藏在物背后的人的关系的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商品都是一个符号，因为它作为价值只是耗费在它上面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2004，p. 110）从这一段分析可以得出：其一，商品，以及作为一般商品的货币都是符号；其二，商品及货币既具有物性，也具有符号性；其三，商品与货币作为符号，其意义是人赋予的，它们所反映出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意义关系。

马克思有关商品、货币的判定已然是符号学式的，他还进一步指出：“货币作为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做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p. 152）换言之，货币即元符号，是关于符号的符号。货币的元符号本质决定了货币的流通并不束缚于某一种固定形式，它可以是贝壳、纸币、金银，甚至也可以是数字，这也预示了虚拟货币取代实体货币的历史趋势。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本身确实内含着符号学思想，且这些思想可以应对当代数字社会的新趋势与新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商品，其本质就是交换符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欧洲学派（European School）将“商品即符号”作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理论基础。奥古斯托·庞齐奥（Augusto Ponzio）认为：“马克思主义批判是一种有效的符号学分析，它将商品作为信息，从交换和生产两个层面对其结构加以研究。产品的生产或者其使用价值的消费，并非商品的奥秘所在。只有在其作为交换价值，作为信息，被生产和消费时，商品才成为商品。所有这些，让经济学成了符号学的一部分。”（Ponzio, 2014, p. 214）这一观点成为欧洲学派讨论商品生产 - 交换 - 消费的符号过程、社会再生产、符号拜物教等的前提。

肇始于商品符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其马克思主义底色恰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社会批判范式，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符号学需要基于符号学范式去阐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无论是经由商品符号分析切入政治经济领域，还是经由符号系统阐释意识形态与文化诸问题，相关理论都被吸纳到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思想谱系中。

自马克思主义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围绕商品分析持续展开讨论：他们一方面着力凸显商品分析之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又将商品落实到文学、艺术、文化等具体对象上并展开形式分析。卢卡奇认为，只有商品问题“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核心的、结构的问题时，它才可能达到这样的普遍性。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在商品关系的结构中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对象性形式和与此相适应的一切主体性形式的原

形”（1999，p. 148）。由此，商品的形式分析成为透视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切入口。按此逻辑，詹姆逊将商品分析落实到艺术作品上，并强化了形式分析之于社会问题研究的意义，即“艺术作品的形式——包括大众文化产品的形式——是人们可以观察社会制约的地方，因此也是可以观察社会境遇的地方。有时候形式也是人们可以观察具体社会语境的地方，甚至比通过流动的日常生活事件和直接的历史事件的观察更为充分”（Jameson，1998，p. 360）。詹姆逊总是能够从文学、电影、艺术品中生发出其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思考，例如通过分析美国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来揭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又如从对毕加索《格尔尼卡》画法的分析，去揭露这一画作“要打破的，正是西方视角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传统的定点画法和透视。……透视其实不是人类的观察方法，我们人类的视角从来就是移动的，因此可以说透视是不真实的，只是一种幻觉，是一种意识形态”（杰姆逊，1997，pp. 154 - 155）。这些研究实现了从艺术形式分析导向社会批判的有效路径。

形式分析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批判路径上至为契合。皮尔斯将符号学视为“关于符号的形式学说”（2014，p. 143），这里面有着明显的形式科学的诉求，即寻求一种明晰的意义分析范式。依此特性，形式分析对普遍性的归纳，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视野。变动不居的经济活动，潜移默化的政治症候，恰需要形式分析作为抓手，以此将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诸多特殊性纳入形式共性之中加以研究。

四、基于形式分析的意识形态批判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不仅能以形式分析为抓手切入政治经济学批判，还能以形式分析为手段导向意识形态批判。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对形式本身的意识形态分析又构成“元批判”。因此，形式分析不仅是方法论，对形式本身的意识形态批判也凸显了形式的本体论。符号学的形式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有共同的意义旨归——真实。真实是贯穿意义活动的底线要求，人对于意义的获取、事物呈现的状态、人与意义世界的联系都建基于真实。“意义探究如果完全不考虑真知，或认为这个问题无法讨论，真假本质上难辨，就是取消了意义的最基本立足点，切断了主观与客观的联系。”（赵毅衡，2016，p. 78）符号学作为意义学，立足于对真实的形式分析；马克思主义对于意识形态的分析，也正是通过对虚假的祛魅，揭露了资本主义

发展的历史真相。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就是将意识形态视为虚假的观念,“首要内涵就是证明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总是由一系列抽象的语词、观念和教义构成”(钟户东,2023,p.9)。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序言中,马克思指认:“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就统治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中共中央编译局,1960,p.15)这些观念的创造物,即“神”“模范人”都是意义不在场的产物。神本身并不存在,人自己虚构了神的样子供奉,在这里“神”只是一个符号,指向人超越自身的观念。人自己创造的符号反过来支配人,人膜拜自己的创造物,这是马克思有关意识形态的批判,即将意识形态视为“种种虚假观念”。

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兰茨·梅林的信中,恩格斯延续了这一说法:“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的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或者从他自己的思维中,或者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引出的”(中共中央编译局,2012,p.642)。这一系列对于意识形态虚假性的认定,肇始于意识形态与现实真理的脱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做的工作,恰是剖析观念产生的现实基础,尤其是经济事实这一决定性基础的作用。

当然,恩格斯也反思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批判上的不足,即“只是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相同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视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2012,p.642)。这一反思恰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在形式分析上的欠缺,因此,将意识形态的生成纳入符号过程(semiosis)可以弥补政治经济学在文化分析上的疏漏,而填补这一疏漏恰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任务,即经由形式分析意识形态的产生、传播与解释机制。

事实上,符号始终与意识形态相关联。“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有意义:它代表、表现、替代着在它之外存在着的某个东西,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符号。哪里没有符号,哪里就没有意识形态。”(巴赫金,1998,p.341)在巴

赫金看来，意识形态必须要符号来承载，所有符号必然渗透着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领域与符号领域相一致。哪里有符号，哪里就有意识形态。符号的意义属于整个意识形态。”（p. 343）这样就将符号分析纳入整个意识形态批判的论域。符号即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即符号，由此延伸出意识形态符号的阶级性问题，这就需要考量使用符号的主体及符号所处的语境。

在巴赫金看来，“符号中反映的存在，不是简单的反映，而是符号的折射”（p. 357）。符号反映存在有一个变形的过程，这一变形不仅反映了符号本体的特征，也引出了符号背后的主体，即谁生产符号、谁传播符号、谁解释符号。巴赫金认为是阶级斗争决定了“符号的折射”，这意味着符号背后的主体决定了符号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由不同的符号构成，代表了不同阶级的“声音”，这些“声音”交杂在一起形成了“社会的多重音性”。

如此，一个清晰的逻辑展现出来：符号领域等于意识形态领域，符号被不同阶级使用，意识形态领域弥漫着阶级斗争。这里廓清了意识形态符号的差异性，也理清了符号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性。也正是这种关联性与差异性，使得意识形态问题不能简单地用“虚假”来概括。正如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家G. 克劳斯所总结的，“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是一个确定阶级的社会观念的总体，意识形态所表达的是这一阶级的历史－社会状况和利益”（俞吾金，2009，p. 130），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不同阶级，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虚假意识形态指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非所有意识形态。

总结来看，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建构立足于两种批评范式，即基于符号形式分析展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基于符号形式分析展开的意识形态批判。虽然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这一定名为欧洲学派所倡导，但实质上，自马克思主义思想诞生起，在马克思主义著作内，以及其后的继承思想中，只要是触及以上两种批判范式，并将批判范式应用于由资本主义制度衍生的符号问题研究，都可以统摄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思想谱系中。

结 语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不只是文本形式分析的方法论（傅其林，2018，p. 34），更重要的是，它同样立足总体性视域关注人的主体性、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的未来命运。马克思主义指出：“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马克思、恩格斯，2014，p. 42）这意味着，人与物的关系始终处于动态历史中，“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

□ 符号与传媒 (29)

种社会力量”(p. 43)。换言之,对资本的反思需要放置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考量,“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p. 48)。由此可知,人的主体性正是在主体间性与社会语境中生成与变化的。

与之相较,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在精神上至为契合。符号学从形式意义角度指出:“每个思想必须与其他思想对话……思想永远以对话的形式展开——自我的不同阶段之间的对话——这样,对话性本质上就是由符号组成。”(Peirce, 1931—1958, p. 253)如此,人的主体性本质上是符号性的,主体间性也是基于符号展开的。“社群也不可能有限,它必须延伸至人类的所有种族,而我们与他们形成直接或间接的知性关系。”(p. 654)意义世界将人类全部关联其中,每个主体的利益与全部人类命运相关。

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从不同角度出发达成了视域融合,形式意义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一道,真正实现了相互补充与共同支撑的理论效用。符号泛滥的文化现实,符号增殖的经济状况,符号真实的视觉混淆,符号人工智能的技术潜能,种种当代现实,都有待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予以阐释与回应,从而继续激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 巴赫金(1998). 巴赫金全集(第二卷)(钱中文等,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 傅其林(2015).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符号学维度审思. 南京社会科学, 8, 16-21.
- 傅其林(2018). 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形态及其启示. 文学评论, 1, 30-36.
- 杰姆逊(1997).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卢卡奇(1999). 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马克思,卡尔(2004). 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2014). 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 皮尔斯, C. S. (2014). 皮尔斯:论符号(赵星植,译).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唐小林(2020). 创新文论话语体系——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 1-12.
- 西姆,斯图亚特(2011). 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吕增奎,陈红,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俞吾金(2009). 意识形态论. 北京:人民出版社.
- 赵毅衡(2009). 符号学文化研究:现状与未来趋势.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12, 169 - 172.

赵毅衡 (2012). 符号学.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赵毅衡 (2016). 真知与符号现象学.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 78 - 84.

赵毅衡 (2018). 符号学作为一种形式文化理论: 四十年发展回顾. 文学评论, 2018, 6, 146 - 155.

张碧 (2022). 社会实践活动中的符号属性——洛塞-郎蒂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及方法.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 130 - 136.

张碧, 唐小林 (编). (2016). 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张一兵 (2009). 反鲍德里亚——一个后现代学术神话的去魅. 学术月刊, 4, 27 - 33.

张一兵, 胡大平, 张亮 (2004). 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逻辑转换. 中国社会科学, 6, 64 - 70.

中共中央编译局 (19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编译局 (20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钟启东 (2023).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意识形态思想.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3, 1 - 10.

Bergesen, A. (1993). The Rise of Semiotic Marxism,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6(1), 1 - 22.

Jameson, F. (1998). Marxism and the Historicity of Theory: An Interview with Fredric Jameson, *New Literary History*, 29(3), 353 - 383.

Peirce, C. S. (1931 - 1958). *Collected Pap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ertrilli, S., & Ponzio, A. (2012). Semantics an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Adam Shaff, *Semiotica*, 189(9), 133 - 168.

Ponzio, A. (2014). The Semiotics of Karl Marx,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10(2), 195 - 214.

Trifonas, P. P. (Ed.) (2015).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emiotics*. Dordrecht: Springer.

作者简介:

陈文斌,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

Author:

Chen Wenbin,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s research field is Marxist Semiotics.

Email: dgsycwb@163.com